

## ■ 文化艺术

# 双轨线上的舞者<sup>①</sup>

——传教士译者詹姆士·理雅各

季红琴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詹姆士·理雅各既是一名成功的译者,也是一名虔诚的传教士。作为译者,他曾饱受质疑、压力重重但却执着专注;作为传教士,他力尽艰险、遭到误解却坚守信仰。他在翻译与传教的双轨上并列前行,却又努力寻找交叉点——翻译为传教所用,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关键词:**传教士;译者;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90-04

詹姆士·理雅各(James Legge)被全世界了解和熟知主要源于他非凡的翻译成就,他是系统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第一人。理雅各一生共翻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数十部中国经典<sup>①</sup>,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极具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被誉为汉籍外译的始祖。他是儒莲翻译奖的首个获得者,被称为“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

作为译者,理雅各无疑是成功的,他为中国经典译介和中国文化外传与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也使西方人有机会了解中国,并开始重视汉学。然而,对理雅各的认识并不能因为他的翻译成就与盛誉而停留在他的译者身份,理雅各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身份——传教士。在华30多年,理雅各的专职身份并不是译者,而是传教士。他翻译中国经典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教义、实现征服中国的梦想。对于这样一位特殊的传教士译者,我们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客观、辩证地加以评判。

## 一 理雅各生平

国内外涉及理雅各生平介绍且较具权威性的著作主要有: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egge, 1905)、《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顾长声, 1985)、《汉学发达史》(莫东寅, 1989/2006)、《汉英、英汉翻译

百科全书》(陈善伟, 1995)、*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Wong Man-kong, 1996)、*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Girardot, 2002)、《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 2002)、《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 2003)、《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岳峰, 2004)、*The Mengzian Matrix for Accommodationist Missionary Apologetics* (Pfister, 2003)、*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Pfister, 2004)、《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 2005)等。较具权威性的相关论述或论文主要有:Lindsay Ride (1960)在《中国经典》第三版所写的“译者传述”、《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王辉, 2003),以及理雅各曾孙 Christopher Legge 对理雅各的纪念文章等。这些著述为了解理雅各的生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却不乏偏差之处。本文在对理雅各的生平信息进行梳理时,对有偏差或争议之处,将以 Legge (1905) 和 Girardot (2002) 为准。

根据理雅各的人生轨迹,理雅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晚期。理雅各早期从一名聪慧的学生转变为伦敦传道会受封代理人;中期为驻派在香港的传教士、牧师并逐渐成长为学者;晚期为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东方学家和比较学家。

### (一) 早期人生

理雅各 1815 年 12 月 20 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

① 收稿日期:2013-0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GJ020);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XJK011BGD015);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1B007)

作者简介:季红琴(1979-),女,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理论语言学研究。

① 本文中“中国经典”泛指中国经典的典籍;《中国经典》指理雅各翻译出版的中国典籍的书名。

郡汉德利(Huntly)小镇一个富商家庭,家中共有四兄弟,排行老小。1827年进入汉德利教学学校拉丁语班,并初露语言天赋。1829年从汉德利教区学校小学毕业,同年进入阿伯丁语言学校开始中学学习。1831年获一等奖学金进入阿伯丁国王学院开始大学学习,1835年以哈顿奖获得者身份毕业于该校。1936~1937年在英格兰布莱克本一所公理宗学校教数学与拉丁语。1837年9月进入圣公会在伦敦的海伯里神学院攻读神学,准备成为一名传教士。1838年开始中文学习,并加入伦敦传道会。1939年5月25日被正式受任为传教士。

## (二) 中期人生

1939年8月理雅各踏上传教之道,携妻子以及另两名传教士前往马六甲<sup>①</sup>,1940年1月抵达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41年11月正式担任英华书院校长,并于1843年任香港英华书院第一任校长。

1848年,理雅各做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加倍努力”,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汉学家”;二是结束“God”翻译之争,接受采用“上帝”为“God”中文译名。1848年至1853年期间,理雅各在香港经历了3次摧毁性的台风,且雪上加霜先后失去了几个女儿和妻子,悲痛中他将自己埋藏于工作,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经典》。

1860年,理雅各开始积极推进香港教育体系改革,他主张集中教育、强调英语教学,在他的推动下,香港逐渐从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1961年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中的“四书”在香港出版,该译本的出版为理雅各日后在翻译领域的权威地位与学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60年代开始,理雅各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翻译,并陆续出版了多部译著,逐步成长成为一名学者。

## (三) 晚期人生

“从其职业生涯一开始,作为伦敦传道会的一名‘传教士’,理雅各就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理雅各开始了一种对于新的学术身份和学术使命的认同。”<sup>[1]55</sup>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定居,此后,他开始埋首于学问,在翻译、汉学、东方学、比较学领域领衔欧洲。1875年,理雅各被授任为牛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1876年,他获得了儒莲中国文学首届国际奖,这是对他为中国经书翻译所做贡献的最大肯定。同年,理雅各开始了他在牛津的执教生涯,直到1897年去世。

# 二 成功而执着的译者

理雅各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少年时期在学校就显示出了翻译拉丁文的特殊禀赋。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掌握了5门语言,此后一直努力学习、持之以恒,掌握和精通了多门语言,包括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当时被认为最难的边缘语言——汉语。

1938年,理雅各开始汉语学习,师从伦敦大学首任汉

学教授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 1797~1843)。来华之后,理雅各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在一次重病之后,他曾在日记和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场病让我的语言学习有些倒退了,但我将在下个安息日努力学习……”<sup>[2]16</sup>坚持不懈的语言学习和纯熟的学术工作习惯为理雅各成为一名优秀的译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理雅各生活的年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带有严重的偏见性,而那些欧洲殖民者对中国的认识更是如此。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理雅各带着偏见来到了中国。但在到达马六甲后,在工作中,理雅各逐渐发现了传教士们对中国宗教礼仪的麻木和他们内心的贪腐,而他自己却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开始学会尊重和理解中国人。随着理雅各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开始运用自己的中文知识阅读和探索中国的经书——中国经典。他认为中国的“四书五经”就是中国人的“福音书和摩西五书”。通过对中国经典的了解,理雅各开始逐渐摆脱之前对中国宗教和文学狭隘的理解和偏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儒家典籍对中国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和重要地位。

19世纪40年代初,理雅各立志翻译中国经典,成为将中国儒学经典翻译为非亚裔语言的第一位非亚裔人。从1841年开始,在王韬等中外人士的协助下,理雅各开始着手翻译中国经典。历时40年,理雅各翻译并出版了两大系列共十一卷《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1~1872年间,他所译《中国经典》共五卷陆续在香港和英国出版,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第一卷);《孟子》(第二卷);《尚书》《竹书纪年》(第三卷);《诗经》(第四卷);《春秋》《左传》(第五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理雅各所译《中国经典》许多都收入了《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sup>②</sup>中的《中国圣书》<sup>③</sup>(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理雅各《中国经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它使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开始重视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为中国哲学、伦理和文学经典提供了走出国门的机会,也使西方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中国经典,它“为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sup>[3]276</sup>。

在华传教数十年,理雅各将翻译视作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蔑视思潮的影响,理雅各通过翻译来实现传教的行为在当时并不被伦敦传道会理解和接受,他曾遭到了许多西方同行尤其是伦敦传道会的强烈反对,传教会甚至致信于他:“因为翻译《中国经典》,您的时间和注意力实际上就难以足够地使用到对整个香港的传道站的充分监管上面,而且还会妨碍您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香港殖民地的传教工作中去。”<sup>[1]52</sup>1858年,伦敦传道会对理雅各做出了新的规定,决定不再资助理雅各出版《中国经典》,理雅各印刷《中国经典》的传道会香港印刷所的所有费用转由理雅各的友人渣颠先生来资助,理雅各不能再向传道会提出资助出版《中国经典》的

① 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1842年被割让给英国。第一个派往中国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将英华书院选址建在马六甲,当时中国并未对传教士开放,因此理雅各先来到马六甲。

② 该书由英国语言学家编纂,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宗教和佛学经典等的翻译,《东方圣书》共五十卷,搜集了多位西方东方文化研究家所译的儒、释、道典籍及印度宗教的主要典籍。

③ 《中国圣书》包含《尚书》《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易经》《礼记》《孝经》《道德经》《庄子选集》《太上感应篇》《离骚》等。

要求。

由于理雅各的翻译工作饱受教会和同行质疑,他的翻译之路充满了艰辛,他本人和伦敦传道会的关系甚至出现了较紧张的局面,但他却执着于翻译传教之路。

为了在传教的同时有时间翻译中国经典,理雅各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自己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奉献给了传教事业,只是利用深夜或拂晓的时间来专注于自己的翻译工作。在写给夫人的信中,理雅各说他一天也没空闲过,丝毫未曾懈怠过,就连周末也不曾休息。每天从外回到家中,除了疲惫还是疲惫,但他还是坚持翻译工作。

理雅各不只是专心翻译工作本身,译作完成后,他还亲自监督译本的印刷、装订和销售。由于在英国印刷出版费用太高,理雅各将印刷改在香港,但纸张和印墨等还得从英国运到香港。译本印刷完成后,他还需亲自去跑销售。香港当时没有英文著作发行商,出售前理雅各还得亲自去书店交佣金,为译本销售提供保障<sup>[2]44</sup>,由此可以想见理雅各当时印刷出版中国经典的艰辛。

作为译者,理雅各对翻译工作的执着、专注和认真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种执着背后的强大精神支柱并非源于对翻译的热爱,而是源于他对信仰的坚定和上帝的忠诚。“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我们的传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获得长久可靠的结果。”<sup>[2]40-41</sup>

### 三 虔诚的传教士

孩童时代的理雅各并未将自己的人生定位于传教工作,据 Legge (1905)<sup>[2]9-12</sup> 和 Girardot (2002)<sup>[1]2-21</sup> 的记载,理雅各成年后踏上传教之路主要源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边环境的熏陶。自 17 世纪 80 年代开始,英国逐渐步入基督教世界传教的热潮,理雅各的家乡阿伯丁郡哈德利小镇成为传教最活跃的地方之一,输送了很多当地人到海外传教,“理雅各家族”更是当地公理会教会的积极成员。二是理雅各父亲的心愿。经过宗教运动的洗礼,理雅各的父母都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对传教活动非常拥护,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的另一个儿子将来也成为一名传教士<sup>①</sup>。三是理雅各内心深处的命运意识。他多次在父亲藏书室里看到米怜寄来的中文宣传材料,这使他逐渐产生一种命运意识——认定自己将成为一名远赴异地传教的传教士。四是兄长乔治的影响。他的哥哥乔治十分信奉基督教,早前已成为传教士,且理雅各与哥哥的感情笃厚。大的时代环境、周边人际环境和理雅各内心的感悟最终帮助理雅各成长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 (一) 困苦与艰险中坚持传教

理雅各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依本内泽·理是个成功的布料商,理雅各之家在 19 世纪初就通过漂白和亚麻布贸易的快速扩张而繁荣<sup>[4]18-26</sup>。但理雅各却在早期就放弃了富足的生活,主动请缨,漂洋过海、历尽艰辛到海外传教。

在前往马六甲的路上,理雅各一行经历了鲨鱼攻击之险、深泥之陷、饮用水缺乏、鳄鱼之惊、毒性蚊虫叮咬等艰险,历时 5 个多月才抵达马六甲。在马六甲的日子,理雅各一家在经济上十分拮据,他曾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只能

吃一点米饭和煮或炸的鱼”,“我已经四分之一便士都没办法节省下来了,我也看不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做得到。……传教士,如果只是在自己义务范围之内行走忙碌的话,很难节省下来什么钱财。”<sup>[2]47</sup>在马六甲,理雅各面对霍乱疫情,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竟然冒险看望和照顾霍乱病人,只为感化他人、获得认可。

根据 Legge (1905) 和 Eitel (1895) 的记载,在香港传教 33 年间,理雅各和家人先后经历了 6 次摧毁性的台风。他本人曾两次在航行中遭遇台风,也亲眼看到自己皈依的教徒和邻居被台风夺去生命,看到居住的房子被台风摧毁,购买的打印油墨被台风卷走等,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摧毁他传教的信念。

在华传教数十年间,理雅各曾经历数次健康危机。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理雅各几次长时间高烧不退,虽然期间有 3 次危机时刻他选择返英治疗,但病魔也没有动摇他在华传教的信念。每次病愈之后,理雅各都加倍努力,重新投入到传教工作。他曾在日记和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这次大病不死,是上帝的保守,我觉得上帝给了我动力。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诚挚、简朴、警醒、谦卑而献身的传教士……”<sup>[2]49</sup>

在港期间,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和生活,加之医疗条件差,理雅各的第一任妻子和 4 个儿女先后死去,但他没有放弃传教事业,甚至在回英后又带来了第二任妻子和女儿帮助他继续完成传教事业。

病痛的折磨、台风的摧毁、家人的病逝、生活的艰苦、社会治安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理雅各传教的信念,他一直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坚持心中的信仰!

#### (二) 误解中坚守信仰

尽管理雅各将自己定位为“好传教士”,将翻译“中国经典”看作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并一再强调自己的翻译工作只不过使在华传教的“伟大工作”具有了学术特征,但他的翻译工作还是遭到了同行和他所属的伦敦传道会的深深误解。他们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会减少他从事传教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传道会董事会亚瑟·提德曼甚至写信明确告诉理雅各,传道会“全体完全一致”地认为他翻译“中国经典”的“特殊工作”会分散他从事传教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管香港的传道站,从而妨碍和影响他在港传教工作。尽管理雅各一直声称自己翻译《中国经典》是为了铸造精神武器的“原材料”,但传道会和很多同行都认为他的翻译会适得其反,甚至许多传教士越来越怀疑理雅各的工作更有助于在欧洲人当中传播东方主义的“伟大故事”,而不是更有助于使中国人基督化,因为他们认为理雅各在翻译中没有态度鲜明地表明立场。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认为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应该对与基督教真理相左的观点、情感等用注释的形式来予以驳斥、说明,以便西方读者们能够明辨是非。但在这一点上,理雅各的翻译显然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的距离。

传道会的误解导致理雅各与传道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但即便如此,理雅各依然坚持自己的传教工作。为

① 理雅各的哥哥乔治此前已经成为一名传教士。

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传教工作,理雅各只能在深夜和清晨来处理其他事物,他说这样“只是为了拥有一个可以奉献给耶稣基督的完整的白天”。在工作中,他依然勤勤恳恳,忠实于传教事业。

1858至1859年理雅各第二次返英度假期间,他所在传道会的董事们对他的传教事业提出了直接的怀疑,并进一步疏远他,这使他感到十分不快和难堪,但即便如此,他还是礼貌地回应“对教会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他提出终止和教会的关系后,依然强调,“我总是将自己的伟大使命牢记于心”,他以学术的方式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忠实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从理雅各决定投身传教的那一天起,他就将传教士的信仰与使命牢记于心,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坚定和忠诚。

## 四 译者身份服务于传教士身份

作为译者,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为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提供了标准的中文读本,也为那些想了解中国哲学、宗教和道德的读者提供一手中文读物。然而,他的译者身份并不是单纯的,这一身份是为传教士身份而服务的,他曾在日记、书信和译评中都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理念。

理雅各早在年轻时就判断,“对于整个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是翻译和皈化之间有差别的平等,即欧洲语言和汉语、基督教和中国人之间实现真正双向互惠。”(理雅各,授神职考试:26-30)“理雅各强调,这种皈化只有通过长期的语言学和道德的翻译来实现。”<sup>[1]21</sup>理雅各认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才能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sup>[5]95</sup>他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迷恋并不“正当”,他一直力图通过译介中国经典来襄助当时在华的传教士<sup>[2]40-41</sup>。谈到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认识,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不是作为一位哲学家看中国,而是以哲学的眼光了解中国。中国对我来说是个伟大的故事,我渴望理解其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sup>[6]</sup>

很显然,作为译者,理雅各的翻译目的、动机都不具备纯粹的学术性,他的译者身份只不过是帮助他更好地

承担传教士这个角色。他将翻译视作归化异教徒的间接工具,这正是对圣保罗传教策略中“知彼”策略的运用。

## 五 结语

在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和欧洲人企图征服东方的时代,理雅各的人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在人生的轨道上,翻译和传教成为支撑他前行的重要“双轨”<sup>[7]</sup>。他将自己积极投身到这两条轨道上,并努力使它们交汇、交融。作为译者,他努力跨越文化障碍,准确地阐释另一种文化的真理,但却超越语言界限,旨为传教服务;作为传教士,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辱宗教使命,采用“知彼”策略,实现翻译传教的目标。在这位文化翻译家和朝圣者的身上,人生“双轨”的交汇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与使命。

## 参考文献:

- [1] Girardot Norman J.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2] Legge Helen 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 [3] 杨慧林. 传教士与中国经典[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
- [4] Raeper William. George MacDonald[M]. Oxford: Lion Hudson PLC, 1988.
- [5] Legge J. The Works of Mencius. Chinese Classics (vol. II)[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0.
- [6] Pfister Lauren F. Clues to the Lif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One of the Most Famou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Sinologists—James Legge (AD 1815 - 1897)[J]. 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egional Asiatic Society, 1990(30): 30-31.
- [7] 何立芳. 传教士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策略解析[J]. 外国语文, 2011(2): 89-91.

# A Dancer on Two Roads: James Legge as a Missionary and a Translator

Ji Hong-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James Legge is not only a successful translator, but also a pious missionary. As a translator, Legge was once suspected and under great pressure, but he was persistent in translation. As a missionary, he met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but he insisted on his beliefs. He went on both along the road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oad of preach, at the same time he tried to find ou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roads: to translate for missionary purpose, and to serve missionary identity with translator identity.

**Key words:** missionary; translator; James Legge

(责任编辑 莫秀珍)